

# 情感革命与现代作家\*

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五四”时期的现代作家们,将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的观念,纳入到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家庭革命之中,使反对封建礼教和道德的启蒙运动落到了实处,从而摧毁了一切旧的情感秩序、人伦关系、社会规范,进而还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的进程或改变文化(文学)的发展方式。

[关键词]个性解放;现代作家;情感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6-0111-04

从文学革命产生的内在动因来看,白话文学的成功,并非是倡导者成熟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而是其自身强烈的情感体验所造成。这既是五四时期的风气使然,又与文人的传统息息相关。发轫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是以西方个体主义为思想武器来批判封建旧道德,重塑新道德的一场个性解放运动。这场“中国文艺复兴”(胡适语)运动,并非空穴来风,有其特有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而就其倡导者们自身的创作动因而言,更多地呈现出情感革命的特征。

中国文人历来都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个性解放的思想无疑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念:民族振兴和重视自我是一致的;追求个人的解放,其终极目的是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个性解放中包含着社会解放。这不仅在现代作家的情感旅程和创作动因中表现出来,而且也能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者的欣赏品味中得到强有力的佐证。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创作,无不是伴随着其自身的情感革命而产生的;鲁迅、胡适、苏雪林等人献身文学,也与其自身包办婚姻的压抑需要宣泄有关。现代作家,几乎都是先以作品闻名,继之以情感生活和浪漫个性为人所知。那些记叙作家个人情感生活的日记、书信或情感自传,如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日记九种》和《毁家诗纪》;徐志摩与陆小曼《爱眉小札》;庐隐与李唯建的《云

鸥情书集》;白薇与杨骚的《昨夜》等等,一经出版,便受到追捧,一时洛阳纸贵,流传久远。

现代作家能立足于文学,并以此为业来抒写自己的感情生活和对社会的看法,得力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新闻及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现代作家的经历、体验几近一致:出生在世纪之交,目睹了满清政府的没落,科举取士的既定人生之路中断,到大城市的新式学校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等等。地域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必然使他们从自然环境和传统礼俗中解放出来。推翻父母在老家安排的包办婚姻,追求个人的情感生活成为当务之急。这必然要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父母安排的求学专业和自己喜欢的文学道路发生严重的冲突。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可路在何方?他们一时茫然不可知。诚如郁达夫所追问的那样:“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sup>①</sup>学而优则仕的参政之路已被剥夺,文人的骨气又不容许卖身给军阀作附庸。在此情况下,投身文学界无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而社会风气中的张扬个性与旧式习俗的矛盾,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在抒写自身情感的痛苦与生存艰难的双重苦闷时,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作家身份与政治的疏离,自我超凡的感觉天赋,尽情抒写难以言喻的情感痛苦和人生遭遇的个人问题,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姿态。他们也因之以表现自己的情感扬名和立足。可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左翼文学观念的

\* [收稿日期]2007-10-11

[作者简介]王鸣剑(1964—),男,汉族,重庆市梁平县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张扬,现代作家的角色从忏悔者扩展到了时代的预言家,有的甚至成为职业革命家。个人的情感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表现个人浪漫情怀的激情和社会公众对此关注的程度逐渐消失。况且,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已走过青春浪漫的岁月,父母的包办婚姻,有的已打破重组,有的改造成功。或许传统因袭太重,重组的婚姻并不彻底,往往以“两头大”的方式行之于世,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牺牲的是没有话语权的女性;离异再娶的姻缘也难得善终,如徐志摩、田汉、戴望舒等;婚内改造成功的也徒留许多无奈,如茅盾、胡适、苏雪林等。倒是那些情感生活回归传统的作家,如巴金、老舍、冰心等,夫妻关系和睦,但反映情感的作品却相形失色。这既与他们个人的性格有关,也和他们与政治疏离的结束相联系。

## 二

弗洛伊德认为,支配人的行为的本能无外乎“力比多”(生的本能)和“达那多斯”(死本能)。前者是由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融合而成的,代表着对生命的追求和爱与创造的力量,指向于生命的生长与增进。后者代表了恨与破坏的冲动,体现了人对杀戮和死亡的原始欲望。本能冲动在体内的积累,应当经常予以释放,以免积累太多引起总的爆发。对作家而言,文学创作就是宣泄生的本能的一种途径,使郁积在心中的情绪在创作中得到释放和升华。而个人情感(主要是恋爱与婚姻),作为生命的原始形态,既与情欲有关,又与社会环境相联系。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窥视个人性格和社会风俗的一面镜子。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使无数青年倍感情欲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因此,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潮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成为他们反抗封建专制的出发点。诚如任何变革都会遭受阻拦那样,撬动封建社会体制根基的包办婚姻,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追求婚姻之外的爱情更是“万恶之首”。在此环境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用文学的形式,不仅言为心声地抒写了自己的婚姻与爱情,而且由此再现和展示了,同代人对家庭和社会的理性思考。所以,婚恋,既促使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文学之路,又由此构成了五四文学的重要内容。

五四时期的第一代作家,在懵懂之中接受了父母的包办婚姻。虽然他们对这种强加的婚事也心生不满,无奈因袭过重,为了孝道,只好哽咽接受。可

随着外出求学,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观念使他们逐渐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对父母戴上的婚姻枷锁倍感痛苦。他们开始抗争,并以留学国外的方式拖延成亲的时间。然而,为了含辛茹苦的母亲,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屈服了,可又于心不甘。于是,就拿起手中的笔,尽情抒写自己对婚恋生活的感悟和爱无所爱、欲爱不能的痛苦,一批文学名著应运而生。

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当他们外出求学时,父母就为他们选配了妻子。个性不同,处理方式自然也有差异。鲁迅将母亲包办的婚姻作为一件“礼物”来看待。内心的烦闷与痛苦,在《自题小像》、《爱之神》、《随感录四十》、《寡妇主义》等文章中或显或隐地流露出来。他与朱安 20 多年苦行僧似的独身生活,形成了猜疑、偏激、郁闷、孤苦的个性心理。这些独特的性格特征,在他前期的小说创作中,以偏冷的色调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后来,他与许广平相识相爱而写下的《两地书》、《伤逝》、《奔月》和《腊叶》等,则闪现着偏暖的柔情亮色。郭沫若五彩缤纷的婚恋生活(与张琼华的包办婚姻,与安娜的异国之恋,与安琳的战地之情,与于立群的终生相守。),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黑猫》、《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和《维奴司》等佳作。郁达夫的《沉沦》、“以诗代简”的情诗、《茑萝行》、《茫茫夜》及续集《秋柳》、《日记九种》、《毁家诗纪》和《乱离杂诗》等作品,都是他在情感上冲闯的结晶。

胡适、苏雪林等人,虽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却屈从母命,长期生活在不幸婚姻的痛苦之中。胡适的挣扎与屈服,堪称五四学人的代表。他为了名声,在保持已有婚姻格局不变的同时,与韦莲司、陈衡哲“发乎情,止乎礼”,和曹珮声共享神仙之乐的婚外激情。然而,在其内心深处,却交织着爱情与责任相互撕裂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的发酵,才使我们看到了《尝试集》、《终身大事》中那些精彩的篇章和情节。苏雪林为了母亲,牺牲了自己狂热的初恋,也因之写成了名噪一时的《绿天》和《棘心》。或许正是因为她和张宝龄的长期分居,才导致了她的性格偏执,一生充满着矛盾与变数,毁誉不断。

随着革命文学的勃兴,反映自由意志的情爱文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更关心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当“革命+恋爱”的创作公式大量盛行时,革命与恋爱相辅相成的格局被打破,恋爱的合法性逐渐依附于革命。社会风气在小说中往往表现为“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宗旨,恋爱的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社会倾向和阅读期待下,现代作家抒写个人



婚恋的作品,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自然也难以引起轰动效应。因而,到 1930 年代后,革命的集体意志逐渐取代了个人的自由意志,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已让步给被赋予了革命内容的新的时代。现代作家抒写个人婚恋生活的作品急剧减少,甚至萎缩。即便是虚构作品中的爱情描写,也只是革命的附庸而已。当然,文坛对作家本人婚恋生活的关注并没有消亡。如丁玲被诱捕后,冯雪峰为了纪念她的一往情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sup>②</sup>:《不算情书》;沈从文在 1940 年代,将自己“婚外恋”遭逢的“偶然”,作为“一种生命的形式”,在作品中隐晦地表现出来等等,但这些毕竟是婚恋生活直接抒写的回光返照。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中的爱情描写被扫地出门,作家个人的情爱倾诉,也就自然萎缩和凋谢了。

### 三

现代作家情感革命的印迹,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都以纪实、幻化和升华的方式表现出来。就人的天性而言,欢乐的时候不会吟咏悲伤的歌曲,痛苦的时候难以抒写欢快的乐章。即便是为了创作的需要,有的作家反其道而行之,那也不过是寄予自己对现实失落的憧憬罢了。

汪静之《蕙的风》中的诗篇,因倾诉的对象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对曹珮声的追求因辈份所造成的阻隔,满含怨尤;而符蓁漪是他名正言顺的恋人,在礼赞之中充满着欢快的色调。郭沫若年轻时,在日本与安娜相爱,虽众叛亲离却甜蜜无比:“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Venus》)人到中年时,郭沫若因于立群的温情而写下了焕发青春浪漫的《陕北谣》。徐志摩历经艰辛和陆小曼走在一起后,激情如“春的投生”,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出现了令人心跳的诗篇《别拧我,疼》。爱是庐隐的命,她遇见了心爱的郭梦良,义无反顾地表示“只要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石评梅因初恋遇人不淑,留下阴影,在高君宇生前未曾接受他的爱,高君宇死后却幡然悔悟,用生命诠释了对他的炽热感情。其袒露心灵、发情为文的诗歌、散文都带有明显的自哭自诉的自叙传成分。戴望舒心目中的施绛年是“一个静娴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

人。”(《我的恋人》)在历经变故后,他仍然难以忘记,他与穆丽娟组成的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一想,会叫人发傻”。张爱玲在遇见了她生命中的克星胡兰成后,写下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描写男女纯情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并对“爱”作过经典的阐释:“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sup>③</sup>老舍对宗月大师女儿的感情,即使在“被别人吻的时候,我心中看着你”<sup>④</sup>他和胡絮青的相濡以沫,达到了“不必说话,而两颗心相对微笑”<sup>⑤</sup>的境地。冰心和吴文藻,因许地山阴差阳错成就的婚姻,铸就了千古绝唱的情书《我的老伴——吴文藻》。《湘行散记》和《边城》是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后甜蜜生活的结晶,特别是集人情美和人性美为一体的翠翠,明显地承载了张兆和的身影。沈从文自己后来就说过,“那里的翠翠,秉性善良处,熟人一看即可明白,和当时的新妇实在相差不多”。<sup>⑥</sup>可以说,没有爱情的成功和新婚的甜蜜,翠翠即使诞生,也非我们今天看到的翠翠。曹禺的“生命三部曲”(《雷雨》、《日出》和《原野》)是他与郑秀相爱时,为“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所写下的“三首诗”,剧中所表现的“人的挣扎”、“生命的蛮性”和“人与人之间极爱和极恨的感情”,都是他对婚恋生活的切肤之感。

### 四

人生失意十之八九,恋爱婚姻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敏感而多情的现代作家们,在传统道德和习俗还根深蒂固时,饱尝无爱的婚姻和有爱无缘的焦虑与痛苦就更为显著。或许正是这种爱非所爱,恋爱和婚姻的不统一,才催生了他们的情感革命,也催化了他们的才情和对现实的理性思考。由于他们把握了生命中的某种共性,既揭示了婚恋情感中的多样性,又丰富了人类的情爱生活,从中孕育的婚恋题材的作品,才焕发出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

田汉在 1920 至 30 年代之交,处于爱情(林维中、安娥)、政治与艺术的三大艰难选择中不能自拔:“忆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劳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sup>⑦</sup>,苦闷与痛苦溢于言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一段浓情,因受双方家长的竭力反对和社会舆论的飞短流长,使他倍感压力。他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为要寻一个明星》、《起造一座



墙》等诗中,就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环境和封建礼教带给他的灰暗感受。经过抗争后获得的婚姻,与徐志摩的理想相去甚远,特别是陆小曼与翁瑞午关系暧昧,由此引发的夫妻双方的猜忌和责备,使他的心情更加恶劣,诗歌创作日益减少,诗泉大有枯竭之势。在诸如《再休怪我的脸沉》、《残春》、《干着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等有限的诗歌中,出现一些反映他们情爱生活不协调的音符。丁玲在面对胡也频和冯雪峰的感情纠葛时,创作了轰动一时的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戴望舒与杨静在年龄、学养、人生经验和生活趣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导致了他们结合后,戴望舒直接抒写他们爱情的诗篇很少。人近中年的戴望舒,对杨静情感的波动与任性,难以把握,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与前妻穆丽娟在“林泉居”度过的美好时光,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好的诗篇:《过旧居》和《示长女》。萧红面对萧军移情于陈涓后,感到自己的情感受到了欺骗和愚弄,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凝结成组诗《苦杯》和《沙粒》。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无疑融入了她当时对婚姻和爱情的复杂思绪:自己和英娣不是胡兰成的两朵玫瑰吗?张爱玲的这种难言心理,始终难以释怀,延续到事隔多年后的《五四轶事——罗文涛三美团圆》中。罗文涛和三个妻子同游西湖的情景,与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到温州看胡兰成,胡兰成数美(爱玲、小周、范秀美)并存的美梦与现实何其相似。白薇与杨骚之间的旷世恩怨,不仅留下了血泪相和流的通信集《昨夜》、自叙传小说《悲剧生涯》,而且在诗剧《琳丽》中,她还通过剧中人物琳丽、璃丽两姐妹与琴澜的爱情纠葛,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凌琴如和杨骚之间的恩怨情仇真实地再现出来。老舍对初恋的记忆刻骨铭心,他与刘大叔女儿的初恋因母亲作梗而夭折,留下难以述说的隐痛,不仅夫子自道地写下了《微神》、《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和《微笑》等爱情题材的小说,而且使他长达十余年执信

“命该如此”的宿命观。在创作中,他对爱情的抒写,总是点到即止,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即使在作品中写到与恋爱有关的女性人物,大多也处于配角,无足轻重。我们在老舍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现代意识的两性描写。沈从文在疯狂追求张兆和而没有得到回应时的苦恼,在小说《丈夫》、《龙朱》、《第四》和《三三》中都有潜在的表现。巴金与萧珊相濡以沫 28 年,患难与共,萧珊死后,巴金含泪写下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等至情妙文。

虽说文学是个人心声的表达,但在这背后却隐藏着它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固然是时代的风潮使然。然而,落实到现代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我们不难发现,情感的压抑和更新,无疑是其重要的原因。无爱的忧郁和对真爱的追求,成为现代作家从事文学的起点,也是其表现的主要内容。他们往往借作品中的人物、氛围和情景,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念和对社会的看法。这些留下他们自身恋情印记的著名作品,既活现了现代作家们光彩照人的身影,也展示出现代文学回归到本真的迷人风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作家的情感革命,既是现代文学产生的基本动因,又是现代文学发展和表现的永恒主题。

#### [注 释]

- ① 写完了《菀萝集》的最后一篇[A]. 菀萝集[C]. 上海泰东书局, 1923. 193.
- ②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中卷[M].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11): 143.
- ③ 金宏达, 于青编. 张爱玲文集(4卷)[C].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7): 78.
- ④ 老舍. 微神[A]. 吴福辉选编: 茶馆[C].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299.
- ⑤ 老舍. 离婚·18[A]. 老舍文集(第二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36.
- ⑦ 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M].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27.
- ⑧ 转引自张向华编. 田汉年谱[M].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12): 110.

(责任编辑:朱德东)

## Emotional revolution and modern writers

WANG Ming-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writers at May the Fourth Movement brought personality liberation and marriage freedom idea into self-experience of emotion and family revolution, which make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for anti-feudal-ethical-code and feudal morality practical, so that all old emotional order, human relation and social norm are destroyed, to some extent, historic progress and cultural or literature development mode are determined.

**Keywords:** personality liberation; modern writer; emotion revolution